
近二十年湖北城镇消费趋势的测算与分布估计

李志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消费日益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城镇消费是当前消费的主体。文章将城镇消费分为被动消费和主动消费,基于被动消费视角,从生理、社会和制度三个维度构造被动消费的测算指标体系,根据《湖北统计年鉴》的城镇家庭收支数据,度量近二十年湖北城镇消费趋势并进行分布估计。

【关键词】被动消费;趋势;分布;金融便利;城镇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1)08-0084-03

1 理论分析

如果将家庭中基于生理限制(比如饥饿和生病)、社会限制(比如符合社会规范的衣着)和制度和习俗限制(比如法律限制)下的那部分必不可少的消费定义为被动消费。这样,家庭的消费就可以分为被动消费和主动消费两个部分,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度量湖北城镇消费的趋势和分布特征。

一般而言,这两种消费的特征不同,需要用不同的消费函数进行描述。比如,对一个病人而言,他的被动消费是医药治疗费用20元,主动消费是电视机500元。在连续凸性的消费函数下面,如果电视机的价格下降了200元,理论上他会选择增加电视机的消费而放弃部分医药治疗费用,但是实际上的选择可能与理论分析不符,因为这样的选择必定会产生高于电视机收益的效率损失或者承担更高成本。另外,社会有效需求的规模并非来自于主动消费和被动消费之和,而是取决于被动消费被满足程度。对于被动消费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贫困线理论。由于一个成年人生存需要热量(我国的热量标准是2100大卡),而热量通常是从食物中获取的,因此他必须每天消费不低于2100大卡含量的食物,才不会影响其基本的肌体功能,才有可能避免出现饥饿和疾病等无效率的情况。非浪费类的食品消费并非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和偏好,而是取决于该消费者的生理需要,所以,食品消费是一种被动消费。

二是必需品理论。必需品的消费通常都是被动消费。由于人类文明的发达、享受水平的提高与范围的扩大、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消费习惯的改变(比如饮食标准的提高所导致的消费变化)等因素,致使生活必需品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基本教育、水电费、交通等都成为当前的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通常具有收入和价格的双重刚性。马歇尔将必需品分为生活必需和效率必需,他指出只有少消费这些必需品一点,降低被动消费的比例,都会出现经济低效率。

三是被动消费程度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很早就有人关注到被动消费的程度问题。当一个家庭被动消费轻微不能满足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JC79010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0b082)

作者简介:李志平(1970—),男,河北涉县人,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发展。

家庭内部会表现出成员轮流挨饿、将孩子送人、有病不医等现象，但是这将影响这个家庭的短期生产率；而被动消费较多部分不能满足还会出现家庭弃婴、放下后代教育、流浪甚至自杀等现象，必然损坏其长期生产率。近年有不少学者关注到由于教育和医疗等被动消费挤占食品消费的现象：高额的学费和医疗费迫使他们放弃了本来就应该拥有的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下降可能意味着逐步的“节衣缩食”和渐涨的“营养不良”。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被动消费与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自主消费是不同的概念：凯恩斯理论是基于与收入有无关的角度来定义自主消费的，自主消费衡量的是除收入以外影响消费的因素，比如股票、债券和房屋所有权等。本文中的消费是在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不能降低其生存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否“必不可少”来定义的，被动消费是“必不可少”的消费。

2 度量体系与方法

2.1 度量体系

根据本文的定义和上面的理论分析，被动消费可以分为两个水平、三个维度、八个指标。两个水平：一是核心水平，它是家庭无法通过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来减少的消费量。消费量低于核心被动消费规模的家庭实际上是举债过日子，破产或者将这种“不满足”和“短缺”传递给下一代也是常有的事情；二是弹性水平，这是家庭可以通过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来改变的消费量，但这个变动通常要降低短期或者长期的经济效率，比如减少医疗费、压缩水电费等。弹性被动消费规模可以通过一些家庭收入增加后，食品、医药费的消费增量来表示，增量越多，则意味着在收入较低时被动消费被压抑程度就越厉害，弹性被动消费规模就越大。三个维度是基于饥饿和疾病的生理限制，基于交通、服装、日用品的社会限制、基于娱教文和住房的制度习俗约束，进而分为八种指标，即食品、衣服、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居住、杂项等。城镇家庭被动消费的度量体系详见表 1。

表 1 湖北城镇被动消费的指标体系

被动类型	被动项目	核心层面	弹性层面	增量指标选择
生理限制	食品			食品消费
	医疗保健			药费和医疗费
社会限制	衣服			缺省
	家庭设备			牙膏等日常用品
	交通通讯			交通
制度习俗限制	娱教文			教育
	住房			缺省
其他	其他			缺省

2.2 度量方法

2.2.1 消费的趋势

确定消费的趋势首先确定消费结构的变化，因为主动消费的比例可以通过被动消费比例分析得出，主动消费比例和被动消费比例之和为1，所以，消费的结构可以使用被动消费占总消费中的比例来进行大致的分析。

考虑到湖北城镇家庭通过信贷进行时间超前和空间转移的消费现象还不十分普遍，入不敷出（总收入小于总支出，或者是可支配收入小于消费性支出）和信贷赤字（当年的现金流入小于现金流出）往往能够体现出该家庭无法通过家庭内部的配置来满足必要消费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的消费量应该是当时的被动消费量。为此用下式计算湖北城镇核心被动消费规模：

$$\begin{aligned} HPC &= \max[DPI(\Delta GI \leq 0), DPI(\Delta DPI \leq 0), DPI(\Delta S \leq 0)] * TRK \\ &= FD * TRK \end{aligned} \quad (1)$$

在（1）式中，HPC 表示所有样本的核心被动消费规模， $DPI(\Delta GI \leq 0)$ 是总收入小于总支出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DPI(\Delta DPI \leq 0)$ 是可支配收入小于消费性支出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DPI(\Delta S \leq 0)$ 是信贷赤字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TRK 表示样本的总人数，TRK 是样本的户数乘以每户平均人数。同时，定义 $FD = \max[DPI(\Delta GI \leq 0), DPI(\Delta DPI \leq 0), DPI(\Delta S \leq 0)]$ 。

另外，湖北城镇弹性被动消费规模，从数学角度看，是核心被动消费的规模的一个增量。因为收入约束的减少可以释放出来的原来被压抑的部分被动消费项目，从新增必需品的量可以对被动消费规模进行度量。新增必需品选择食品、医药费、牙膏等日常用品、交通和教育等必需品（详见表 1 中的指标增量选择），其中，衣服、住房和其他消费项目按照 DPI 等于 FD 群体进行消费，故认为其增量为 0。弹性被动消费规模的计算公式如下：

$$TPC = \sum [X_i(DPI > FD) - X_i(FD)] * RK \quad (2)$$

在（2）式中，TPC 是湖北城镇弹性消费的规模， $X_i(DPI > FD)$ 表示可支配收入大于 FD 的群体在食品、医药费等方面的支出，i 是指食品、医药费等消费项目。 $X_i(FD)$ 是可支配收入正好等于 FD 的收入群体的相应消费项目的量，RK 是所有 DPI 大于 FD 的人数，这个人数等于户数乘以户均人口。

因此，总的被动消费规模（PC）就是：

$$PC = HPC + TPC \quad (3)$$

根据定义，可以将总消费（TC）分为两个部分，主动消费（ZC）和被动消费（PC），即有：

$$TC = \sum CE_j = ZC + PC \quad (4)$$

在（4）式中，TC 为所有样本的总消费支出。

然后再定义两个比例，一个是被动消费比例（RPC），另一个是主动消费比例（RZC），其中， $RPC = PC / \sum DCE_j$ ， $RZC = ZC / \sum DCE_j$ ，j 是所有的样本数量， CE_j 为第 j 个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通过 RPC 的指标变化可以大致分析湖北城镇消费趋势的变化。

2.2.2 消费的分布

被动消费比例（或者主动消费比例）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指标，其变化本身可以反应一部分湖北城镇消费分布的信息；另外，对城镇消费的分布的描述还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消费分布函数、消费基尼系数、消费中最高收入20%群体所占的比例（下文称之为高收入占比）等等。限于文章篇幅和数据的可得性，在被动消费比例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本文选择高收入占比和总消费基尼系数对主动消费的分布进行重点测算。

3 度量与检验

3.1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的城镇家庭总收入、总支出、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以及表1 中的食品消费支出、水电费支出等数据，均来自于《湖北统计年鉴》（1993~2010）年中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城镇居民收支情况”中的数据。选择1992 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是因为1992 年前后的《湖北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收支的指标发生了变化，1993 年的数据是1992 和1994年的简单平均得到。

消费性支出的基尼系数（用GN(CE)来表示）是通过几何运算得到，方法是将洛伦茨曲线与该曲线凸向的哪一个折线之间的面积T 计算出来，则有 $GN=1-2T$ ，进而用各组数据代入基尼系数的简化公式之中得到的。这个简易公式是： $GN=\sum RK_i CF_{i+1}-\sum RK_i+1CF_i$ 。（其中，i 为组的个数，i 从0 到n 取值，n是总组数， RK_i 表示的是第i 个点的横坐标， CF_i 表示的是第i 个点的纵坐标）。使用各年的家庭收入数据中的分组消费支出数据，分别计算1992~2009 年各年的基尼系数。使用简易基尼系数公式计算出来的值偏小。

被动消费规模（PC）使用（3）式进行计算。

H20 是将主动消费规模（TC 减去PC 后的剩余部分）中最高收入20%的群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

3.2 度量

3.2.1 湖北城镇消费趋势

根据（1）、（2）和（3）式计算出湖北城镇被动消费的规模（PC），然后除以总的消费支出，得到被动消费的规模比例RPC，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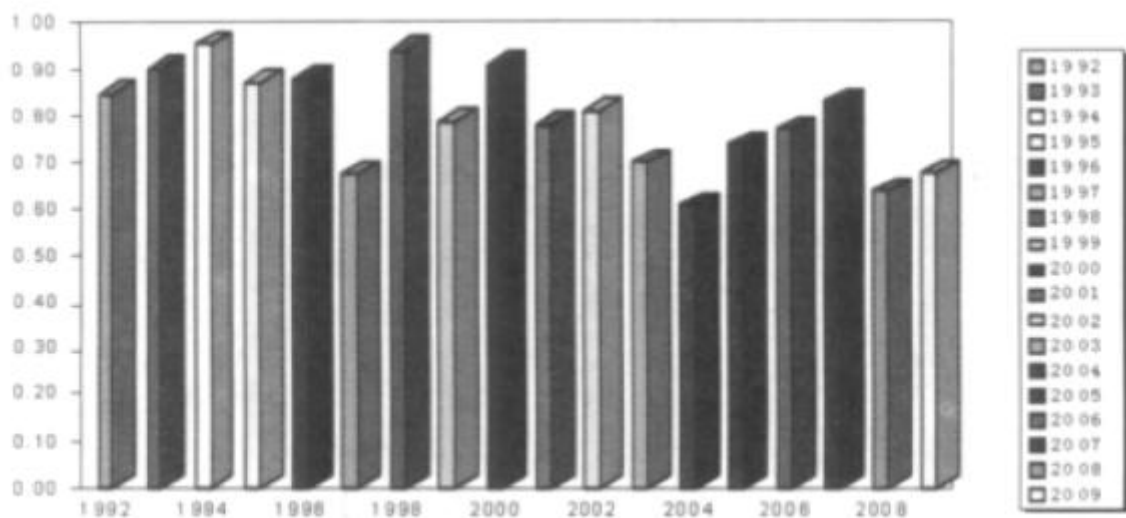


图 1 湖北城镇被动消费的比例(RPC)

在图1 中，湖北的城镇被动消费的比例平均值是0.8，整体呈现向下趋势。向下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北开始重视农业投入而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进而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得食品类和服装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同时通过增加了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抵消了居民的一部分被动消费，这一并降低了被动消费的规模；另一个方面，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致使这三个方面的价格上涨，增大了居民被动消费的规模。被动消费比例的变化趋势具体取决于两个方面力量的较量。

由于主动消费比例是被动消费比例的余数，从图中也可以分析出湖北城镇主动消费的趋势变动。近20 年来，湖北城镇的主动消费比例的平均是0.2，整体呈现向上的趋势。0.2的比例说明湖北城镇居民消费中自主选择的比例还比较低，“闲钱”还比较少；而趋势上升则说明，在同样的收入条件下，湖北城镇居民得到了产品消费的福利和市场选择的福利，因此总的福利水平提高了。

3.2.2 湖北城镇消费的分布

同时使用被动消费的比例、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和按照可支配收入的最高20%占主动消费的比值（H20）来进一步分析湖北城镇消费的分布，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详见表2。

表 2 湖北城镇消费的分布

	被动消费 的比例	GN (CE)	最高收入 20%的占比
1992	0.85	0.14	0.78
1993	0.90	0.16	0.89
1994	0.95	0.17	1.00
1995	0.87	0.16	0.86
1996	0.88	0.18	0.85
1997	0.68	0.17	0.79
1998	0.94	0.16	1.00
1999	0.79	0.19	0.81
2000	0.91	0.20	1.00
2001	0.78	0.20	0.85
2002	0.81	0.23	0.88
2003	0.70	0.21	0.84
2004	0.61	0.20	0.78
2005	0.74	0.22	0.81
2006	0.77	0.23	0.82
2007	0.83	0.20	0.88
2008	0.64	0.23	0.81
2009	0.68	0.25	0.83

从H20 这一栏看，在研究期间，H20 的变化范围在0.78~1 之间，平均是0.86。这充分说明，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支配着湖北城镇的主动消费规模和比例。根据储蓄函数，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往往与储蓄的比例一致，最高收入的20%的群体实际是金融资源的绝对占有者和湖北当前消费力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短期的消费政策（比如消费税收的减免）和意外的经济冲击（比如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对湖北消费的冲击实际上就是对H20 的冲击。

在1992~1994 年的高通胀年份使得H20 在1994 年得到第一个最大值1， 表明湖北经济的潜在购买力在当年100%存在最高收入的20%的手中。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湖北经济的时候（1998 年），城镇收入的整体下降，降低了主动消费能力，当时只有H20 成功留在“水平面”之上。对照被动消费的比例一栏，从2000 年后，H20 值基本上处于一个稳态，在0.83 附近上下波动，而湖北城镇被动消费的比例却是在下降，即主动消费的比例在上升，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推断，最高收入的20%群体所占的主动消费的规模并没有随主体消费的规模增加而下降，而是同比例上升，湖北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贫富差距改善的迹象。

从 GN(CE)这一栏看，GN(CE)呈现出一个随着时间而上升的趋势。在 1992 年，GN(CE)只有 0.14，但是到了 2000 年上升到

0.2，再到 2009 年上升到 0.29，近 20 年，基尼系数增加了一倍多。从 2000 年后，结合最高收入 20%的占比一栏中最高收入 20%的占比基本维持不变和消费基尼系数的稳步上升，可以说明，湖北城镇的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被动程度更大了。由此可以认为，最低收入的 20%的城镇群体的现福利状态比 2000 年恶化了。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如下结论：虽然湖北城镇的被动消费总量下降，但H20 是主动消费部分的绝对多数，最低收入的20% 人群的被动消费的程度加深，低收入群体日益远离主动消费。这样，增加消费在发展的推动力量、促进湖北发展方式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要减少被动消费的项目，提供城镇居民的长久消费能力。在被动消费未被满足时，虽然可以通过消费引导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增加主动消费份额，从而增加总消费水平，但是，这种消费增加不但不能增加居民的福利，还可能减少福利，势必难以长久。为此，在增加城镇中下层居民的社会保障的同时，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品供给能力，降低被动消费的范围和项目，进而为主动消费留出资金空间和消费空间，推动湖北长久消费能力。

二是优化主动消费的分布结构，激活城镇居民的短期消费能力。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政府补贴，短期的政策绩效都来自于H20 的消费潜力的挖掘。为此，需要从建设消费场所、增加交通设施、减免消费税收、缩短消费审批环节、提供消费示范等方面进行政策指引。

三是增加金融便利，增加城镇居民满足被动消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因为金融手段的多样性和便利，可以将临时处于被动消费群体低成本借用其他时间和其他空间的资金，从而避免整个家庭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保护消费的增长潜力，同时可以减少社会的被动消费规模。相关的政策包括：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建立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增加消费信贷的规模和方式等。

参考文献：

[1]李志平. 武汉应培育消费竞争力[N]. 湖北日报, 2010-05-25.

[2]苏方杰, 邹芳. 恩格尔系数在中国失灵问题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07, (28).

[3]尹世杰. 消费力经济学[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4]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